

# 考古发现赓续历史文脉 活化历史场景

□张强禄

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曾经说过，“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而言，广州的城市考古是在与超大型现代都市高速发展同频共振的脉搏跳动下，以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赓续文脉的初心使命在努力地缀合广州城市发展的脉络和图景。

广州，这座拥有2240年建城史、1800年得名史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独特之处也在于“城心”历经沧桑而未曾迁移。这既为我们提供了探寻连续不断文化堆积的珍贵现场，也给考古工作带来了“见缝插针”、如同拼图般的特殊挑战。我们的工作，正是在这层层叠压的历史年轮中，读懂它的“生长”轨迹，履行保护文物、传承文明的职责。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的《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重视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作为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始终在思考：如何在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工作中，不仅完成科学发掘，更肩负起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使命，为城市留下更多历史记忆，保存更完整的文化基因。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考量，我们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2025年度工作汇报的焦点集中于城市考古，也是希望通过系统梳理与呈现，揭示广州古城空间的演进逻辑，为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智慧，也为具体落实

2025年8月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年)》提供了考古注脚。

## 城市考古发现 缀合历史图景

我们在“2025年广州城市考古新发现汇报会”上公布的四项重要考古发现，为这幅持续的“城市拼图”增添了至关重要的新图块。其中，荔湾区广能发综合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在古城西郊取得了突破。清理出的南越国时期的高等级建筑构件、环绕大型居址外围的壕沟遗迹，不仅说明了西村—西厂这一片区在秦汉广州古城西侧的重要地位，也为文献所载“陆贾城”的传说和现今的“坭城”地名及“陆贾文化园”历史内涵的解读提供了考古线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整体扩建项目历经十余年、连续六次的考古工作，堪称“久久为功”的典范。它清晰地揭示了宋代西城城墙与护城河（西濠）的格局，并呈现了护城河北岸高岗区域从战国末至近现代，在“墓地”与“居址”之间屡次转变的复杂人地关系。尤为难得的是，发掘还明确了医院前身——城西方便医院于民国六年（1917年）修筑的护坡墙等遗迹，生动诠释了考古工作既能梳理古代脉络，亦能为近现代城市变迁提供坚实实证。

而在越秀区光塔路茶树巷古城遗址，唐代堆积中大量的外来瓷器、波斯蓝陶片与玻璃器碎片，直接反映了唐代“蕃坊”西澳码头贸易的繁盛；南宋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则可能与官方仓库“廨库”相关。这些发现从相对微观层面，为我们理解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开放特质提供了具体的物质载体。

将这些点状发现置于更长的时空轴线上观察，我们能更清晰地把握广州城市发展的面貌。以我们持续工作的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为例，其揭示的从东汉末年至晚唐五代不断修筑的城墙，标定了汉唐广州古城早期的西界。这引发了我的思考：至少在唐与五代南汉以前，广州古城的范围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其核心区域，主要是官署与管理机构所在。我们看到，如光孝寺、六榕寺、华林寺等重要宗教建筑，在东汉末年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虽已出现，但其位置均在当时的城外；即便到了唐代，包括怀圣寺光塔，也都是位于城西的蕃坊区。这说明，与全国同时期大多数重要都邑一样，广州在北宋以前，其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场所，是与商业经济及宗教信仰场所以分开的，后者并不纳入“城”中。

正如史学界经常提到的“唐宋变革”，五代十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到了北宋，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直观的现象是，原本在城外的光孝寺、怀圣寺光塔、六榕寺等，到宋代已被扩大的城墙包纳进了“西城”。这一空间变



坭城遗址发掘区域航拍(遗迹分布示意图)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化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海上贸易持续繁荣。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市民生活与商业活动突破了里坊制的束缚，成为城市扩张最直接的动力。考古发现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所描绘的繁荣市井景象相互印证，让我们得以“见物、见人、见故事”，从残砖断瓦中，联想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从大小马站、西湖路、仙湖街这些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里，我们仍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宋代西湖的波光、南汉仙湖的烟云，都凝固在街巷的名称中，成为城市记忆的活化石。让我们这些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外省人都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底蕴深厚的城市，而这些俯拾皆是的历史痕迹，正是其魅力之源。

## 守住文明传承的阵地

认识今天的广州，要从认识广州的历史开始。读懂广州，离不开考古学这把钥匙。我们的工作看似零碎，却意义深远。它要求我们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坚守自己的初心使命，像前辈青灯黄卷、筚路蓝缕的赤子之心一样，守住文明传承的阵地。这绝非一代人所能完成，需要的是几代人的接续努力和不懈

工作，通过科学发掘、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将深埋地下的历史独特价值发掘出来、呈现出来、阐释出来。

展望前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一方面，要持续配合好城市发展建设，在“考古前置”的制度保障下，更有效地获取地下文化遗产信息；另一方面，必须投入更大力量，加快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与转化。发掘仅仅是开始，如何在此基础上讲好、讲透、讲活广州故事、岭南故事，让考古成果从学术报告走向公共知识，赋能于当代城市的文化建设与精神滋养，是我们面临的长期课题。

我们将继续秉持“大考古”的思路，在实践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发展的平衡之道，让考古发掘所揭示的“遗痕”，不仅停留在探方剖面，更能以恰当的方式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可阅读的历史、可感知的乡愁。这既是对“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的践行，也是我们考古人守护千年城脉、赓续岭南文心的初心与使命。唯有如此，广州，这部书写在大地之上的厚重史诗，才能在新时代继续其生生不息的生长传奇。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 从“山水定城”到“商业立市”： 广州跨越千年生长的历史密码

□陈泽泓

广州得名至今已有1800年，若追溯建城史，更可上溯至2000多年前。这座城市何时开始闻名天下？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番禺（今广州）便被列入全国九大都会，《汉书》亦再次确认其都会地位。在2000多年的发展史中，“山水定城、商业立市”的独特密码，始终塑造着广州的城市品格与发展脉络，并形成了与其他古城不同的特征。

## 千年不移： 广州城“原地生长”

秦代任嚣始建的任嚣城，面积仅0.25平方公里。此后，广州便在原址上不断拓展。

与北京、西安等城市在变迁中持续向外扩张、城市中心多次迁移不同，广州最显著的特点是城址不移。从建城之初至今，城市范围始终在今越秀区范围内“原地生长”，历经两千多年而未改其址。

州古城北倚越秀山，凭借山势形成天然防线。秦始皇大军南下，也须在今大北路一带凿山开道才得以入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扩建广州城，将宋代子城、东城、西城合而为一，开拓北城八百余丈，城墙横跨越秀山，并修建镇海楼，既为军事瞭望之用，亦成城市地标。广州城不同于一般的古城四面环绕护城河，其北面因明代在越秀山上建的镇海楼，没有开挖城河，历史上从未有被敌军从北面攻占的记录，正说明“负山险”的可靠性。

水，则是广州的生命脉络。广州城南面的珠江河段，正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与南海相汇的连通要道，是名副其实的“江海会合之地”。因而具备了东西联通几千里，面向南海的这一地理优势，让广州从建城之初便具备了成为岭南区域中心的先天条件。

## 经济特征： 商业立市，开放包容

广州从建城之初，便是一座以商业和经济利益为核心驱动的城市。据《淮南子》记载，秦始皇经略岭南，便因看重这里的象牙、犀角、玳瑁等来自海外的奇珍。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开放与贸易深植于广州的城市基因。

早在秦汉时期，番禺已是我国的主要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从汉墓出土的文物熏炉、玛瑙、水晶、琥珀等，可作为广州与海外贸易来往之实证。

唐代广州作为一个外贸商城，专为外商居留设立规模庞大的“蕃坊”。与唐代长安、洛阳实行严格的里坊宵禁不同，广州不仅开设夜市，而且城门洞开。宋代城南面所开城门特别多，城门的命名也极具特色，“航海”“善利”“阜财”“朝宗”等名称，直白地彰显了城市对外贸易与经济都会的特定属性，这在国内古代城市中独树一帜。

宋代广州城外珠江边建的海山楼，是市舶司管理海舶和外商的场所，在此接待和欢送外商。这种重商、开放的城市特质，是其他古都难以比拟的。

（作者系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

## 循千年中轴，探广州城脉

□李灶新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广州城市考古的工作者，我时常感到，我们的工作就像是在时光的断层中穿行，用手中的手铲，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层又一层的历史帷幕，去拼接、去验证、去还原那些在文献中语焉不详的故事。广州城最令人着迷的特质之一，便是其城市核心区两千余年基本未移，并在原地叠加生长，形成了一部可被“阅读”的立体史书。而贯穿这部史书的核心线索，就是我要说的这一条承载着政治秩序、商业文明与对外交往的千年传统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北起越秀山上的镇海楼（相传为越王台所在），向南经今天的省财政厅、南越国宫署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与“千年古楼”遗址，直抵天字码头。它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脊梁，更是理解广州两千多年发展逻辑的一把钥匙。

## 中轴线的奠基：从秦郡治到南越国都

过政治中心”，广州正是这一规律的绝佳例证。这种稳定性，也使其成为“中国理想地方秩序的杰作”，反映了古代广州相对长期稳定的地方治理传统。

## 中轴线上的商业脉动：千年商都的见证

这条中轴线，不仅是政治秩序的轴线，也是商业文明跳动的脉搏。北京路，作为中轴线南段的重要载体，其商业基因源远流长。

唐代，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一职，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海外贸易管理的制度化开端。

值得注意的是，市舶使并非独立行使管理权，而是与地方行政长官共同协理。

外商货物经抽税后，便可“列肆而市”。

这个“市”，并非围绕官署，而应是位于珠江北岸码头附近自然形成的港市或草市。

唐代的珠江北岸，约在今大佛寺附近，或曾为码头，考古发现那里堆积大量唐代陶瓷器，可能是装卸货物时破损的陶瓷器的堆积。

到了宋代，商业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城市的物理扩张，而这背后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北宋熙祐四年（1052年），广源州首领依智高趁广州城垣不备，突袭广州。

当时，只有作为行政中心的“子城”得以保全，而城西聚居着“蕃汉数万家”的繁华商业区（即蕃坊，今光塔路一带）却遭劫掠。

这一惨痛教训，促使朝廷迅速批准了此前多次被驳回的筑城请求。

于是，北宋熙宁年间，广州扩建了东城，并修筑了保护蕃坊商业区的西城。

城墙的扩建，直接源于保护商业税源这一强大经济动力，生动体现了商业活动对广州城市形态演变的塑造力。

近年来，在当年蕃坊区域的光塔路茶树巷古城遗址，考古发现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注脚。

这里出土了丰富的唐宋至五代十国时期的波斯蓝釉陶器、玻璃器碎片，以及来自定窑、越窑、长沙窑等全国各地的瓷器。

所以这里很可能曾是外商采购中国瓷器的重要集散地。

同时，还发现了南宋时期可能与官方仓库“廨库”相关的大型建筑基址。

这些遗迹，无声地诉说着唐宋时期城西“蕃坊”作为国际贸易社区的繁荣景象。

宋元明清，此地则始终是广州最高

地方行政机构的驻地——宋代，这里既是广州州衙所在，也是广南东路经略安

抚使司治所；元代，在此设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明清两代，则长期为广

东承宣布政使司（藩司）衙署所在地。

这完美解释了为何广州的“城心”与中轴线能千年不易：因为，作为岭南区域

的行政中心，其治所始终锚定于此。正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瑞强调，真正的城市中轴线必然“穿

## 中轴线的延续与叠加：历代治所的心脏

广州，这种以历代地方行政官署为核心的空间格局，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惊人地稳定延续。五代时期，虽然南汉国亦在此短暂建都，出土了相关的遗迹遗物，其地望与功能，可视为对前代政治中心位置的继承与发展。

宋元明清，此地则始终是广州最高

地方行政机构的驻地——宋代，这里既是广州州衙所在，也是广南东路经略安

抚使司治所；元代，在此设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明清两代，则长期为广

东承宣布政使司（藩司）衙署所在地。

这完美解释了为何广州的“城心”与中轴线能千年不易：因为，作为岭南区域

的行政中心，其治所始终锚定于此。正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瑞强调，真正的城市中轴线必然“穿

过政治中心”，广州正是这一规律的绝

佳例证。这种稳定性，也使其成为“中

国理想地方秩序的杰作”，反映了古代

广州相对长期稳定的地方治理传统。

到了宋代，商业的繁荣直接推动了

城市的物理扩张，而这背后有一段惊

心动魄的故事。

北宋熙祐四年（1052年），广

州扩建了东城，并修筑了保护蕃坊商业区的西城。

城墙的扩建，直接源于保护商业税源

这一强大经济动力，生动体现了商业

活动对广州城市形态演变的塑造力。

到了宋代，商业的繁荣直接推动了

城市的物理扩张，而这背后有一段惊

心动魄的故事。

北宋熙祐四年（1052年），广